

中国社会心理学十年回顾与展望

石秀印 刘卫平

我国的社会心理学自1979年重建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

这十年是它复苏的十年，也是它迅速发展的十年，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

由于政治与社会的原因，解放后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以致30年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学科。1978年，一本杂志的目录上出现了“社会心理学”的字样，但那篇文章是对社会心理学进行批判。时间仅过一年，《光明日报》于1979年5月31日发表《建议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王极盛）一文，揭开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序幕。

此时，社会心理学在其发达国家里已经有了71年的历史。自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 Ross）与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 McDougall）分别出版他们的《社会心理学》以来，社会心理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辉煌的成就。美、日、英、法、意、澳、德、加等国家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们做了众多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与教科书。仅在美国，从1908年到1980年期间，就先后有约150本社会心理学著作出版，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达一万余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家，社会心理学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新的飞跃。

重建后的社会心理学走着一条学习、移植、模仿、消化、改造的道路。

1981年，苏联E.C库兹明和B.E谢苗诺夫主编的《社会心理学》一书由卢盛忠最先翻译，由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内部向全国发行；1984年，苏联Г.М安德烈耶娃主编的《社会心理学》由蒋春雨翻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美国克特·W·巴克主编的《社会心理学》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翻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J.L.弗里德曼、D.O.西尔斯、J.M.卡尔史密斯的《社会心理学》由高地、高佳翻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陆续有十余种国外著作被翻译出版。同期，全国报刊发表了几百篇译作或介绍性文章。在翻译与学习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也陆续编写、出版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著作或教本，如周振明、孙松屏编著的《社会心理学概论》（1984、1986），全国八院校编写组的《社会心理学教程》（1986），时蓉华编著的《社会心理学》（1986），陈纪方著的《社会心理学》（1986），孙晔、李沂主编的《社会心理学》（1987），沙莲香著的《社会心理学》（1987），孔令智、汪新建、周晓红著的《社会心理学新编》（1987），乐国安、钟元俊主编的《社会心理学》（1988）等十余个版本。与此同时，我们还翻译、编写了300余种分支社会心理学、应用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与读本。向国外学习和社会心理学书籍的翻译、编写、出版，缩短了我国与国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科学研究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讲学、培训活动与翻译出版同步进行。1982年春,北京大学邀请吴江霖讲授社会心理学,系统介绍了社会心理学的性质、方法论、社会化、社会知觉、人际影响、跨文化心理学、舆论和态度、团体(集体)行为、社会心理学应用等内容。这是社会心理学在讲台上首次出现。1982年5月,中国社会学会开办第二期讲习班,邀请美籍华人陈郁立讲授社会心理学。从1983年9月起,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为期一年的社会心理学进修班,请国内著名专家讲学,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名学员参加学习。以后,以社会心理学为主题的培训班、讲习班、进修班接连不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会1987年春在北京举办的社会心理学培训班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论与教学专业委员会1988年暑期于青岛主办的社会心理学讲习班,在各单位普遍经费紧缩的情况下,仍有大量学员报名参加这些班。讲学、培训活动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普及,扩大了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壮大了学科队伍,为社会心理学的十年发展起到了有利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正规性的社会心理学教育也开展得生气勃勃。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开设了社会心理学课,1983年,武汉师范学院教育行政管理专修科开设社会心理学课。此后,社会心理学在高等院校的心理学系、社会学系、管理学系和其他系,在一些党政干部院校和成人院校,被列为必修课或选修课。1983年以后,我国陆续招收了社会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办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班。正规化的社会心理学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经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

1982年4月22日,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同年9月改名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成立。全国专家、学者170余人出席大会,选举出44人的理事会,选举陈元晖为会长,通过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暂行章程》,吸收会员186名。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也是指导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后,北京、广东、上海、湖南、广西、江苏、黑龙江、天津等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地方性社会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自成立以来,召开了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所属的“理论与教学”、“军事社会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和“青年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专业讨论会,各地方性学会举办了年会等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仅1983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一届年会就收到理论和实际调查方面的论文98篇,内容广泛,选题众多,讨论了社会心理学发展方向等方面的重要问题,确定了3个方面的研究重点。社会心理学会在团结和组织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协调各地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促进社会心理学繁荣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成立学会,充分调动了广大非社会心理学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热情,从而壮大了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力量,形成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研究体系。

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计划》明确提出“……社会心理学等,也要加强研究”。全国人大这一决定标志着政府对社会心理学科的正式肯定。这种肯定和加强研究的意向改变了30多年来人们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偏见,解除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从事研究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心理学的振兴。

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式组建“社会心理学研究室”,集中了7

名研究人员；广州师范学院正式建立“社会心理学研究室”。此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系所相继建立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室或教研室（在有些系所内，社会心理学与其他学科联合组室，如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发展心理、社会心理与心理学史教研室”）。1988年，北京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分别设立了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这些研究和教学机构集中了国内较高水平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成为社会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基地，推动了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开展和水平的提高。

社会心理学十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1年为酝酿期，从1982年到1984年为学习和初建期，从1985年以后开始进入发展和研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酝酿、学习和机构组建，我们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体系有了基本的了解，培养起了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和部分青年专业人员，建立起了相应的研究组织，为开展研究准备了理论工具和方法方面的条件。同时，教学工作、对外交流工作和民族自尊心呼唤自己的研究成果，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促使社会心理学界提出解决方案，这些都促进了第三个阶段的到来。

进入发展和研究期的主要标志，是学术活动的增多和有关研究成果的发表。一些水平较高的研究报告，如《我国中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调查研究》（中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研究协作组，1985），《青年择业倾向与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态度》（白南风，1985），《人在集体组织中行为动机的研究》（胡寄南，1985），《非言语沟通的视觉信息在电视教学中的作用》（王二平，1986），《群众对物价变动的社会心理反应》（物价心理课题组，1987），《党内不正之风繁衍的社会心理分析》（陈纲，1987）等，都是这一阶段产生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报刊杂志从1979年到1984年间只发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报告和调查报告73篇，而从1985到1988年10月即发表378篇；1984年以前的报告主要集中于社会化和个性方面，1985年以后的报告则涉及到社会化、个性、态度、自我意识、人际关系、团体集体、社会认知、社会比较、社会促进、人际影响、群动行为、社会风气、环境心理等各个方面。这些研究填补了我国的许多空白，丰富了教学和著作内容，使社会心理学真正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随着学习、出版、培训、研究及其他学术活动的开展，社会心理学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出版应用社会心理学书，刊登有关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文章，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和知识，一时间形成了不大不小的潮流。从报刊杂志刊登的有关文章看，应用社会心理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活动渗透到各个方面，如政治工作、司法工作、劳改工作、机关管理工作、安全保卫工作、民政工作、青年工作、工会工作、妇女工作、军事工作、市政建设、企业管理、商业销售、旅游服务、新闻广播、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秘书工作、科研管理工作、教育及学校管理工作、体育训练、卫生和医疗工作、计划生育工作、经济与政治改革、恋爱过程、社会交往、家庭与婚姻关系处理，等等。而且，这些方面文章的数量有成倍增加的趋势，仅1988年即有1000余篇。

十年来，全国有多种报刊刊发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其中主要有《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心理学报》、《心理科学通讯》、《心理学探新》、《心理学动态》、《四川心理学动态》、《行为科学》、《青年研究》、《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及多家大学学报。这些报刊在推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正在积极筹办《社会心理学》会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社会心理学在十年内取得了如此的成绩和进展，不能不令人

感到高兴和欣慰。

二

我国社会心理学十年的发展带有哪些特点呢？它有哪些长足与不足呢？

1. 关于学习与独创

民族的发展最忌闭关自守，科学的发展最忌固步自封。社会心理学从它重建之日起就没有犯忌。它大胆地、毫无保留地向外国同行学习，特别是向苏、美、日、加拿大、澳大利亚及西欧的先进国家的社会心理学学习。我们翻译出版了12个国家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介绍了它们较高质量的专业论文，请国外学者来华讲授他们的经验和理论，派留学生、进修生到国外学习。我们的学习不象解放前那样只学美、日，不象解放初那样只学苏联，而是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我们的学习是公开的，大胆的，全面的，坦然的，毫无虚伪做作的。这是我们十年发展的一大特点。

我们的社会心理学起步很晚，缺乏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对先进国家的有关情况做出深入了解，分析地、批判地吸收他们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从中找到借鉴和经验，使自己及时跟上世界潮流和发展水平，避免从零开始，少走弯路，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学无止境。国外的社会心理学日新月异，新研究、新成果、新理论不断涌现，为了不至掉队，必须步步紧跟。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引进了一批著作，将它们翻译出来，充实了自己，启发了别人，就赶快回过头去进行下一次的引进，下一次的翻译，而来不及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从事自己的研究。因而，社会心理学界的知名人士首属翻译家，较少著名的研究家。

我们也出版了一些国内学者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做为向国外学习的成果，它们在人才培养和应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只要将它们与国外的著作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很多书从体系、观点到材料大部分都是国外的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大同小异，或者是美国的翻版，或者是苏联的翻版，或者是日本的体系，或者是几家的混和。有人说，社会心理学的十年是“来料加工”的十年，是“拼装组合”的十年。这一说法尽管有些偏激，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翻版”国外著作，在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特定条件下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必经阶段。但是，起始往往决定着未来，如果长此以往，把重点放在“搬运”工作上，那无疑会束缚自己的思考，成为人家体系与框架的奴隶。于是，我们将会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著作。对当前的这一势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警觉。

当然，我们并不全都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不少学者在引进国外的理论与观点时，注意到对它们的评价与批判，注意到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也注意到它们对于我国的适应性，反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种态度和做法对于外来疾病的传染无疑具有免疫作用。不过，我们在这样做时，时常缺乏科学的态度。对于外来的理论和观点，我们往往不是用自己的实验、调查来检验它，不是用严密的科学论证来反驳它，不是用大量的资料、数据来说明它，而是用我们的传统思想做尺度去衡量，用一成之见作武器去批判，用某些大人物的言论去推翻。其结果，不是用不科学批判了不科学，就是用不科学批判了科学。前些年流行的对马斯洛(A. H. Maslow)需要层次论的评价和争论，就不能说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研究方法的进步，“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前进

的”（巴甫洛夫语）。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同样依赖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前进。比起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我国的方法论基础和具体研究方法基础更显得薄弱（我国古代即有不少朴素而精辟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却没有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在学习国外的社会心理学知识成果时，也不倦地汲取其得出这些成果的方法和工具。一些有志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更是如此。几年来，我们学习了国外的实验法、观察法、社会调查法，学习了实验设计，翻译、修订了量表等测量工具，学会了统计处理并进口了计算机和软件包。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研究和实验，取得了不少成果，不但锻炼了队伍，而且增强了自己的研究意识，在科学地进行研究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学习国外的研究方法推动了国内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抑制了自己的创造性。一些人看到国外的东西那么先进，认为自己怎么绞尽脑汁也搞不到人家那种程度，或者觉得自己搞设计费时费力，不如搬来人家的省事，就全盘接受人家的东西，利用人家的理论构想和假设，模仿人家的研究设计和程序，移植人家的量表和观测指标，在中国国土上用中国人做测验和实验。其结果无异于在本国建立起他国的实验室，用中国人的数据和资料去验证人家的假设和结论，或者说明中国人的心理与其他国家的有哪些细微的不同。照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的研究无疑会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爬行，不可能有自己的独创和特色，不会有较大的建树和贡献。前几年，国内用柯尔伯格（L.Kohlberg）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概念及研究工具，重复他的研究设计及结果，就多少带有这种色彩。

我国传统的价值观是重知识，轻能力，这一倾向也反映在学习和引进上。具体表现是，引进知识、观点多，学习人家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少；引进研究方法与工具多，学习人家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少；只注意“社会心理学是什么”，不重视“社会心理学如何才是什么”。拿来了馅饼，没去学人家怎样考虑去做馅饼，这似乎是导致上述诸问题的原因之一。

潘菽于1984年指出：“无论在学习苏联心理学上，还是在学习欧美心理学上，我们都曾有过照搬的不良后果的深刻经验。今后，我们要坚持避免向外国学习的照搬办法。”这是老一代“过来人”的由衷之言。社会心理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对外交流和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以往的教训，记住应该坚持的方向。

2. 关于务虚与务实

十年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提倡，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界的社会宣传。我们的不少翻译工作、出版工作、研究工作、学会工作及分支社会心理学的建立，都是从宣传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后社会心理学在社会上得以出头露面，即开端于《光明日报》的《建议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文。以后，我们的发展又得到著名专家的多次讲话和数百篇宣传文章的提倡与推动，如《要研究青年的“需要”》（柳松，1980），《研究读者心理学》（洪祥，1980），《不要忽略了人》（费孝通讲话，1981），《政治工作者要懂点心理学》（程学超，1981），《研究点消费心理学》（张岩，1981），《家庭、社会应重视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王亚林，1982），《大国在准备军事心理战》（王健刚，1982），《发展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吴江霖，1983），《社会心理学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陈元晖，1983），等等。这些文章的作者（或讲话者）高瞻远瞩，思想敏锐，善于提出问题，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考，引发人们的兴趣和研究热情。同时，他们也为学科和分支学科的重建造了舆论，使得后继者得以大胆地学习和研究，使得社会心理学迅速普及并得到社会的承认。重视宣传工作，借宣传为学科发展打通道路，是我们的一个

特色。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思想浓厚的国家里，这方面的工作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在我们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应该记下这些宣传者、提倡者的功劳。

另一方面，在报刊文章中也不难发现，某些宣传过后，能够及时跟上来的文章很少，扎扎实实的研究报告更为少见。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不少刊物上接连发表关于“要研究读者心理学”的文章，可读者心理究竟应该怎样研究，读者心理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特点，却很少有人提及并加以研究。当然，从提倡、宣传到研究成果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可是，在社会心理学的某些方面也确实存在呼吁多，响应少；提倡多，行动少；风声大，雨点小；甚至有人专司呼吁、提倡之职，而不愿踏实地干点实事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欠缺之处。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由简到繁、由浅到深、由不成熟到较成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初探”往往预示着本学科的长足进展，“初探”众多可能是学术繁荣的征兆。纵观近几年的报刊文章，所得印象之一即是其中的“初探”、“浅谈”众多。例如，“社会心理学刍议”，“军事心理学蠡测”，“消费心理初探”，“赌博心理浅析”，“赛场心理浅谈”，“谈谈人事心理学问题”，“后进生心理浅析”等等。这些“初探”“刍议”等不但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而且还就某一方面的问题做了初步的讨论，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可是，在某些方面的“初探”、“浅析”、“简析”、“略论”、“刍论”、“粗探”、“漫谈”背后，也或多或少地隐藏着一种危险，这就是，“刍议”之后缺乏“熟议”，“略论”之后较少“详论”，“浅析”之后较少“深思”，初论之后没有再论、三论、四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10月，全国报刊其发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3480余篇），有力度之作却很少。不少文章或者就事论事，或者泛泛而谈，或者牵强附会，没有自己的中肯见解，更缺少透彻的问题说明和系统的理论建树。只满足于“初探”，只停留在“刍议”的水平上，社会心理学的繁荣是不可能到来的。

当然，初议大多数是初学者所做，这与他们的研究能力和素质有关。一些专业工作者正在勤奋地研究，深入钻研某一方面的问题，力争就所研究的问题有所发现。他们不但力图认识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现象及变化特点，而且力图认识社会心理学学科本身，对于社会心理学自身的理论问题（社会心理哲学）做了较多的探讨，写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如《心理学的心理学与心理学的社会学》（高觉敷，1982），《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心理看作是社会意识的低级层次》（王海成，1985），《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冯长荣，1985），《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沙连香，1986），《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贡献》（周晓红，1987），《社会心理层次结构体系建构的新设想》（李海荣，1988）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近几年的一些专业学术会议上，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们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对象、任务等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发表了较深入的意见。在学科发展之初就能从总体和深层上把握这些问题，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远见卓识的学者在我国尚不够多，既能务虚又能务实的学者也不够多。在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的影响下，我们在做学术工作时往往习惯于先抠概念，论定义，从抽象的层次上考虑问题，而较少“一杆子插到底”。要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必须先弄清什么是社会心理学，明确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划清它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圈定它的研究对象。可在学科发展的初期，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又难以取得一致。于是，就左思考右探讨，埋头于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而很少直接地抓住社会中的具体心理现象，积极行动起来

来, 扎扎实实地研究几个实际问题。因而, 也就较少务实性的研究成果, 较少再论、三论的出现, 较少为社会心理学学科理论的建立提供资料基础。

另外, 从近几年的文章标题中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有些学者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或研究报告, 但每篇文章都更换一个新的内容, 每一研究都重新涉猎一个领域, 自我意识、归因、社会化、人事、消费、犯罪各个方面。我们很难说这一特点是长处还是欠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研究, 似乎有助于全面收集资料, 待将来从总体上把握其间的本质联系, 但也显得零碎、肤浅, 难以取得较深入的认识和高水平的建树。

3. 关于理论与应用

从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 十年来的社会心理学在哪一方面更活跃一些呢? 似乎可以说, 是应用。

这一特点可以从各出版社所出版社会心理学类书籍的内容中看到, 因为出版社出哪些书反映出社会和读者的热点。从1979年到1988年12月, 《全国新书目》共刊登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目346种, 其中社会心理学理论方面的34种, 占9.9%, 其余90.1%均与应用有关。其中, 个人生活方面的(如《人际关系的艺术》、《教你能说会道》、《祝你社交成功》等)最多, 有65种, 占18.8%。爱情、婚姻、家庭与两性方面的(如《爱情心理学》、《夫妻相处的艺术》、《夫妻心理沟通艺术》等)52种, 管理方面的(如《管理心理学问答》、《应用管理心理学》、《组织管理心理学》等)49种, 商业贸易方面的(如《消费心理学》、《现代销售窍门》、《商业心理学》等)38种, 教育方面的31种, 法律方面的(如《犯罪心理学》、《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分析》等)17种, 军事方面的11种, 政治思想工作与宣传方面的10种, 医疗卫生方面的8种, 旅游服务方面的7种, 劳动人事与文化新闻方面的各5种, 科技情报方面的4种, 政治、交通、财经、体育、改革、残疾及其他实用方面的共10种。

而且, 社会心理学应用类书种在同年总书种中所占的比例自1984年以后表现出上升趋势: 1984年为88.9%, 1988年1月至10月为94.9%。

在报刊杂志中, 有关社会心理学应用的文章更是多得难以计数。

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系的书籍的大量出版和文章的大量刊载, 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 反映出社会心理学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反映出社会心理学的较强生命力。应用有助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有助于在社会上扩大影响, 有助于研究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 收集资料, 促进理论研究的开展。正如恩格斯所说: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

然而, 与应用的热点相比, 我们的理论研究却显得比较落后, 比较薄弱。我们的专业理论研究者数量较少, 难以对如此众多的社会实际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一些人反应迟纯, 对大量实际问题和社会需要漠不关心, 埋头于纯而又纯的理论问题的探讨, 所得出的结果流于玄虚, 较少实用价值。一些人急切近利, 忙于引进外国的东西, 迎合读者和出版社的需要, 较少着手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一些人侧重于追求研究成果的数量, 侧重于研究社会中的各类心理现象和思想动向, 不大动脑筋作深层的探讨。一些实际工作者缺乏系统的理论背景知识和足够的科学研究能力, 难以将研究所得上升到理论。所有这些, 都造成了理论研究滞后,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理论与应用脱节, 影响了基本理论和应用学科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第198页。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应用就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质,潜藏着某种危机。第一,应用多是被动的、急于立杆见影的应用,应用者不是在具备一定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融汇贯通地解决问题,而是在遇到难题时求助于社会心理学。因而,难免出现不管有用没用,适用不适用,拿起来就用的现象。第二,我们的应用很多是“泊来品”的直接推销,国外有用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照葫芦画瓢难免有较大的盲目性。第三,理论界缺乏对实际问题的了解,所提供的知识、方法等不一定符合实际工作者的需要,应用起来难免“隔靴搔痒”。第四,由于缺乏科学的研究和理论的指导,应用领域难免鱼目混珠,一种不科学的东西趁虚而入,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起到反作用。如果长此以往,人们很可能在哪一天发现社会心理学解决不了问题,高喊上当,骂它是江湖骗子。

令人欣慰的是,近二、三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其标志是一些专业工作者开始深入实际,从理论与应用结合的角度研究现实问题。例如去工厂研究人的管理和工作积极性调动问题,去工商企业研究广告宣传问题等。仅在改革和管理方面,目前就已经发表了一些水平较高的研究报告,如《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杨冠三等,1985),《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的社会心理反应》(杨冠三等,1985),《激励职工工作积极性方式的比较研究》(李昌煌,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的社会心理障碍》(吴玲会,1987),《改革中职工的行为心理及其对策》(肖焕新,1988),《企业中职工需要和激励问题的初步研究》(李小云,1988)等等。这些研究使政府、管理者和民众对社会心理问题有了更多的注意,对实际的、影响工作进行的社会心理现象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为改革方针政策的制订和管理方式的选取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的社会心理学会大有希望。

应该指出,在这条有希望的道路上也存在某些不可忽视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是“唯上倾向”和不善于系统地观察问题。唯上倾向即是按照上边的意思进行研究,通过揣测上边的想法确定课题,通过了解上边的意向进行资料收集,通过调查结果验证上边的决策正确,而不是真正实事求是地探讨实际问题,得出结论。科学研究一旦失去了认识真理的功能,受到权力与财力的作用而发生偏斜,它也就失去了理论与应用的意义。这种现象在某些政策研究机构时有出现。“不善于系统地观察问题”即只依据几个数据就提出观点,而不考虑这些数据与其他现象的联系;只抓住某些社会心理问题就提出对策、建议,而不考虑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和条件。这类研究也较少具有理论和应用的价值,在对策研究特别是改革问题研究中值得注意。改革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社会心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人员素质不是很高,资料积累较少,在这样的基础上轻易提出对策和建议,难免给改革出馊主意。

4. 关于研究重点

社会心理学是介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重点研究个体或若干个体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有着广泛的研究领域。在美、苏、日等国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人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如社会知觉、归因历程、人际吸引、人际沟通、人际作用、社会影响、利他行为、侵犯行为、社会化、态度与态度改变、群体心理现象等。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我们更多注意的是哪些问题呢?

重视大型群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是我国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改革时期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吴少春等,1985),《中国大学生的性格特征研究——人际关系性格特征的考察》(李德伟,1986),《对贫困地区农村青年几种心理的调查分析》(雷

涛, 1986), 《关于旅客心理的调查报告》(陈晓萍, 1986), 《在民族同化中民族心理素质的持久性——关于西双版纳“帕西泰”生活与习俗研究》(马维良, 1987), 《生育观的社会心理态势分析》(王俊群, 1988), 《五·一九骚乱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何新华, 1988)等, 都是这方面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报告。据不完全统计, 从1979年到1988年10月, 全国报刊共发表此类研究报告92篇, 占总数的23.5%, 其中1979—1981年每年1篇, 1982—1984年共7篇, 1985年8篇, 1986年12篇, 1987年29篇, 1988年前10个月33篇。可以看出, 这方面的研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大型群体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广泛进行的社会调查。如“全国青年工人调查”, “全国青年农民调查”, “公民政治心理、消费心理调查”, “中国公民的生育意愿调查”, “报纸、电台、电影、电视受众调查”, “全国职工生活、思想、态度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一般规模宏大, 取样少则几千, 多则几万、几十万, 最高达到66万。它们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大型群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侧重于大型群体共有的社会心理现象, 研究特定社会群体的心理与社会环境变化间的相互关系, 探讨社会心理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规律。这对于科学地解释、预测和控制社会思潮, 对于进一步研究社会变动、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三者间的关系, 对于社会心理学本身的理论建设, 都具有重要意义。沿着这一方向做深入研究, 我们的社会心理学有可能走出一条中国化的路子。

但是, 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方法比较原始, 研究内容比较简单, 研究变量比较单一, 不能准确、全面、动态地反映特定群体社会心理的状态、结构和变化。其次是大型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过于庞杂, 决定其特点、引起其变化的社会心理环境多种多样, 无所不包, 研究中很难找出某一社会心理变化与某一社会变化间的对应关系, 确定哪些社会变化引起了哪些人的哪些变化, 哪些人的哪些心理变化引起了哪些方面的社会行为变化和社会变化。所以, 较难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进行小型群体和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有可能补充这些方面的不足, 有助于定性、定量地分析, 但目前这类研究较少。

重视需要、动机、理想、价值观的研究, 是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第二个特点。近十年来, 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有《国内十省市在校青少年理想、动机和兴趣的研究》(全国青少年理想、动机和兴趣研究协作组, 1982), 《大学生择业倾向调查》(吴增基, 1984), 《青年工人与文化生活——关于我省青年工人文化生活需求变化的调查》(董鸿博, 1986), 《对65名要求入党的大学生信念的形成和特点的研究》(张嘉伟, 1986), 《对临床医护人员心理需要的研究》(张聪沛等, 1988)《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变化》(张宛丽, 1988)等, 共113篇。其中1981年2篇, 1982年10篇, 1983年12篇, 1984年4篇, 1985年13篇, 1986年26篇, 1987年17篇, 1988年前10个月29篇。可以看出, 这方面的研究也有递增的趋势。

研究理想是我国的传统, 研究需要、动机和价值观, 是当前世界上的一大潮流, 需要、动机、理想、价值观的研究是中西文化影响的结果。它对于探讨人的社会行为动力和活动定向, 了解心理动力的结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 调动人的社会活动积极性, 都有重要意义。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之处, 在于测量工具效度较低, 对需要、动机、理想、价值观的内在机制及其间的相互关系探讨较少, 从总体上把握这些因素与社会因素间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

近年来研究较多的另一方面的课题, 是青少年及老年人的社会化。从1979年到1988年10月, 这方面共发表68篇研究报告, 如《在班集体影响下学生道德品质形成过程的社会心理分

析》(朱文彬等, 1979), 《国内81个地区5—11岁儿童道德判断发展调查》(全国儿童道德判断协作组, 1982), 《蒙古族儿童公有观念发展的实验研究》(张慕蕴等, 1985), 《短期训练对矫正儿童不公正行为的影响的实验研究》(陈会昌, 1986), 《城市与农村儿童参照团体的比较研究》(傅宏, 1987), 《在退休老年人爱的心理的若干方面代间认识差异的初步研究》(胡君辰, 1986)等。其中, 1979年1篇, 1982年6篇, 1983年7篇, 1984年6篇, 1985年11篇, 1986年9篇, 1987年18篇, 1988年前10个月11篇, 也呈现递增趋势。

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大部分就职于学校, 很多是从教育心理、发展心理学“改行”而来, 或者横跨社会心理与教育、发展心理各个学科, 而且教育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在我国有较长的历史。所以, 他们从事青少年社会化方面的研究较多一些, 所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较强一些, 所发表的研究报告的水平也较高一些。同时, 在课题和方法上模仿国外的东西也较普遍, 在社会化规律和研究中国的特有方面, 近几年没有大的突破。

对于其他方面的内容, 如社会知觉、自我意识、归因历程、人际吸引、社会态度、人际作用、社会竞争、社会风气、社会舆论等, 近二、三年有了一些研究, 表现出良好的势头, 但仍显得零散。

十年研究发展中的第四个特点, 是理论和应用研究所涉及的社会领域方面, 目前尚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具体地说, 对教育、青年、犯罪、企业管理及图书馆方面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较多, 对党的建设、国家管理、政治组织、科研管理、社区与环境方面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较少。似乎可以说, 以人为工作对象的领域, 集中了较多社会心理学专业人员的领域, 与社会心理学知识“距离”较近(如学校、图书馆)的领域, 得到了较多研究。

5. 关于研究方法

近十年内社会心理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主要是社会调查和问卷测量。对大型群体社会心理的研究, 对需要、动机、价值观与理想的研究, 几乎全部采用这些方法。在社会化与企业管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面, 较多地采用了标准化的心理学量表。这些量表大部分来自国外, 经过国内修订。这几种方法简单易行, 能同时对众多的对象施测, 收集大量数据, 在研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被采用较多的另两类方法是经验总结和个案分析, 多见于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图书情报工作、犯罪及犯罪矫正方面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运用这些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 用问卷法、经验总结法和社会调查法做出的研究报告较运用量表法的科学性较差, 学术水平较低。这是因为相当大一部分问卷编制粗糙, 不合规范; 二是因为人们很少从所获数据中挖掘其内在联系; 三是难以对研究中的相关因素进行较精确的定量分析。

运用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所得出的结果, 科学性较强, 学术水平较高, 但使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并不多, 主要是研究生做学位论文时采用。这方面的薄弱一是因为实验设计较为复杂, 不少人没有受过有关的专门训练; 二是因为对社会心理问题进行现场实验室实验较为困难, 现场实验的条件不容易控制; 三是经费与实验设备不足。近些年, 各单位都做了各种各样的内部改革, 这些改革可以说是最好的现场实验, 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很少参加进去。

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是对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不够重视, 报刊上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论文凤毛麟角。人们或者固守于思辩的习惯方式, 或者什么方法方便就采用什么方法, 而较少分出时间来探讨新的、更好的方法。这种状况无疑影响了

研究的开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三

在今后的十年，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

成就与问题并存，发展与矛盾齐驱。在即将迈入下一个十年时，研究人的需要与价值观的社会心理学，首先有必要明确自己的“最大需要”，澄清自己的价值观。

1. 激扬科学精神

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机器大工业、航海和交通运输业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研究一切、探索一切的科学潮流。就是在这一潮流中，孔德创立了社会学，冯特创立了心理学，在这两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了社会心理学。

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力发展科学，社会心理学即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1936年后，个人迷信兴起，教条主义滋长，创造精神受抑，科学热情降温，社会心理学也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遭到批判。50年代末60年代初，赫鲁晓夫进行社会改革，解放了思想，重视了人的地位，加强了科学研究，社会心理学才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随着“科学救国”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提出，社会心理学于本世纪初传到我国。在“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潮流中，社会心理学得到初步发展。1922年张耀翔首次进行选举问题的民意测验，接着又进行中国青年的情绪研究、民间迷信活动研究、商人心理研究。陶德怡1924年从事“中国善恶字研究”。陈鹤琴进行了婚恋心理研究。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和“人事心理研究社”进行了“比较民族心理学之研究”，萧孝嵘进行了民族心理研究，朱道俊进行了领导品质实验研究，均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旧中国的独裁与愚民政策没有给社会心理学多少发展天地。

1949年以后，苏联对我国的影响加强，左的思想滋长，民主与科学气氛不足，大陆社会心理学被打入冷宫，出现了整整30年的中断。

1979年以后，我国重新提倡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尊重科学，尊重人的本性，社会心理学才得以重建与发展。

历史和遭遇证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是与民主制度、思想解放及对人的尊重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国家、民族及社会成员的科学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其发展是由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发展，其障碍也主要在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不充分。而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科学的容纳与推崇。所以可以说，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最需要推崇科学的社会环境和科学的科学精神。它不应该等待这种环境和精神的到来，而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条件，去创造环境。

科学精神也是学科精神。社会心理学能够诞生、存在与发展，就在于它是一门科学，具有科学精神。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应该激扬这种精神，明确自己的价值定向，这就是：认识社会心理现象，认识社会心理的结构与功能，认识社会心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这是社会心理学最根本的价值观。

社会心理学的科学精神来源于社会心理学专业人员的科学精神。我国社会心理学十年的发展，就在于专业人员培养起来了这种精神，而十年发展的种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科学精神的不充分。喜欢照搬而较少创新，喜欢务虚而较少务实，喜欢“游击”而较少“攻坚”，喜欢追求数量、名气、收入而较少建树和发现，喜欢直接应用而较少扎实的基本理论研究，有大量的粗浅文章而较少高水平的论文，都与科学精神不足有关。那些出众之作则无

不凝聚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有必要以科学发现作为自己的主要需要，以科学认识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价值标准，激发科学热情，增强科学意识，提高科学研究素质，丰富科学头脑，淡化权、名、利思想，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2. 参与社会生活

社会心理学在明确自己的认识价值的同时，还应该澄清另一方面的价值，这就是联系实际，参与社会生活。

美国是社会心理学最发展的国家，也是它参与生活最积极的国家。本世纪2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去工厂帮助改善管理，意外地发现了霍桑效应，引发了人际关系运动，丰富了社会心理学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热心研究军队士气，解决团体偏见、舆论及后方营养摄入方面的社会心理问题，在态度及态度改变和团体动力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60年代，美国人生活方式变化，校园骚乱，黑人运动，妇女解放，风起云涌，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们为社会寻求解决的办法，开展了社会行为综合研究，提出了认知均衡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归因理论、角色理论、符号相互作用理论、行为交换理论等一系列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纵观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史，不难看出许多对它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都是从参与社会生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开始的。

苏联的情况同样如此。一些学者热心于解决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引起的社会心理问题，由此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进展。E.Д.巴雷金说过：“社会心理学要敢于大胆地提出与解决社会生活中各种最骇人听闻的问题，不要怕做安宁的打扰者”（1981）。

社会生活是社会心理的载体，是研究课题和资料的来源，是对已有假说提出质疑和修正的根据，是检验、证实已有理论的科学与真理性标准，是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动力和真正归宿。社会心理学必须联系实际，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和它的学科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过去的十年，我们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还很不够。社会心理学所做的事情与社会要求它做的事情还相差很远。我国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在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方面的巨大变革，新思潮、新问题、新阻力层出不穷，党风问题，干部腐化问题，不公平感问题，吃大锅饭问题，干群关系紧张问题，怠工问题，犯罪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工作积极性低落问题，离婚率增高与家庭关系淡化问题，卖淫、性病、纳妾问题，都在呼唤着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变动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失衡，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对于研究社会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社会心理学来说，改革中的社会即是一个大实验室。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应该同那些政治家、经济学家们一道参加这场实验。

社会心理学参与生活，主要是为社会管理和社会决策服务，为改善社会风气、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素质服务。有些人认为，社会心理学在决策者那里根本不受重视，他们在摸着石头过河时根本没有想到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无能为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有必要拿出自己的科学成果，透彻地说明一些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配合其他学科和实际工作部门有效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扩大自己的影响，赢得决策的参与权。

3. 加强基本理论研究

社会心理学发展和成熟的标志是理论体系的建立。它的认识价值不仅是对社会心理现象加以描述，而应该达到化繁为简的理论层次。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不仅是通过提供观察和数据，而应该通过那些能够说明社会心理本质联系的理论，以此解释、预测、控制社会心理

反应和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学的认识价值和功利价值应该在理论层次上统一起来。我们有必要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如前所述,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变。

忽视基本理论研究与我们做学问的不良价值观有关,如追求名、利,急于求成等。也和学习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有关。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偏重于实用,长期不重视理论,近些年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我们不应该重蹈复辙。

基本理论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心理理论的研究,即将对社会心理现象的观察和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能说明社会心理现象内在规律的理论。二是社会心理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即研究学科的性质、对象、体系、方法、发展方向和战略诸方面的问题,形成关于社会心理学哲学方面的理论。前一类理论关系到社会心理学认识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占有,后一类理论关系到这两类价值的增值方式。

我们首先应该加强社会心理基本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不一定非要等弄清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对象等问题之后再行,而可以在现有认识的基础上,先选择一些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心理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时不一定选那些深而又深、大而又大的题目,更主要的是具有理论的头脑、理论的准备和理论的敏感性,注意从司空见惯的社会心理现象中发现其内在联系,从众多的现象中发现其共有本质,从现实中发现已有理论不能说明的问题并加以解释。

理论可以分为若干高低不同的层次。在近期内,我们应该着眼于研究并提出社会心理学的低层或中层理论,即与海德的归因理论、凯利的归因理论、达利的责任扩散理论水平相近的理论。待积累起足够的材料之后,再进一步发展高层次的理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心理学也只是积累起一些低层与中层理论,而且显得矛盾与分散,只要我们积极努力,在这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可能的。

社会心理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应该随着社会心理理论研究的发展而发展,总结社会心理理论研究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理论,逐步解决社会心理学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例如学科性质问题,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的关系问题,研究方法问题,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等等,为它的进一步前进扫除障碍,指明方向。在这些方面,我们尽管起步较晚,但国外的进展也较缓慢,只要潜心努力,取得一定的突破也是可能的。

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学派,应该有相应的研究中心,有优秀的理论带头人,有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百家争鸣,互相促进,争取学术研究的繁荣。在过去的十年,我们的研究多数是各自为战,很少学术争论,即使争论起来不是上升到政治问题,就是十分短命。我们应该改变这种“各家自鸣”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标新立异,敢于让人家一辈子不同意。应该知道,“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确立,与其说由于反对者声明自己搞通了,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逐渐死光了,而新的一代一开始就熟悉这个真理”。^①

4. 走中国化道路

陈元晖最近指出:“我们没有也不需要中国的物理学,中国的化学,但要有中国的社会心理学。”^②这就是说,社会心理学应该走中国化道路。

走中国化道路关系到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在社会心理学史上,日本是学美国的,至

^① 普朗克:《科学自传和其他论文》,1959年英文版,第33—34页。

^② 陈元晖 1989年1月27日在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会常务理事会议上的讲话。

今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基本是跟在美国后面走。我国台湾也是学美国的，同样吃了一些亏。这就是：①研究理论薄弱；②重复过多，许多研究使用同一种工具；③绝大多数未反映中国文化、社会及家庭特色，无从建立自己的理论（杨国枢，1985）。

人的心理同人的生理一样，也存在着普遍性运动规律。但是人的社会心理与普遍心理不同，它更多地受到社会环境及周围他人的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别国的不同，人的社会心理特点和具体规律就可能也有不同。即便看起来是同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其内在结构、变化规律、制约因素也可能十分相异。我们应该着眼于中国国土上的社会心理现象，提出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社会心理学要参与社会生活。每个国家内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不同，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不同，所研究的课题就应有所不同。我们应该研究自己的问题，参与自己周围的社会生活，不能一味跟着人家转。

社会环境不同，人的社会心理的内容和内在层次结构不同，对内容优劣、层次高低的评价就会不同。在中国被认为优秀的品质，在他国即可能被认为是劣等，在中国被认为发展程度高的人，用西方的工具和标准衡量可能被视为不成熟。我们有必要研究自己的内容和层次结构，建立自己的评价标准。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是以社会心理为对象的方法，其科学性、客观性受制于对象的特性。对于“你是否急于结婚”这样的问题，西方人爽快地答“是”，中国人却可能答“不”，尽管他急于结婚的心情不亚于西方人。因而，如果不加选择地搬用西方的测量工具，可能会得出虚假的数据和错误的结论。我们有必要探讨对本国人有效的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

社会心理的研究不等于社会心理本身。社会心理是研究对象，社会心理研究是科学反映，科学反映受到反映者主观状态的影响，社会心理学的结果、理论、方法等受到研究者的社会心理的影响。对同一事实，受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具有不同的价值定向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解释。国外的研究成果很可能受到该国社会心理环境的扭曲，并不完全反映客观实际。因而，对国外的结果、结论、方法等不能完全照搬，而应该通过自己的研究，使理论更具有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论是对于研究对象、结论、理论、概念还是对于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僵化、懒惰的照搬、移植、跟着人家走，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应该走中国化的道路。社会心理学的认识价值和功利价值应该在中国化道路上得到统一。

走中国化道路不等于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等于夜郎自大，把别人的东西看成一钱不值，更不等于反接受国外那些使社会心理学研究得以成功的科学态度和认识方法。我们当然应该继续面向世界，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虚心学习人家的理论、方法、科学态度与研究经验，但是，在引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社会心理的特殊性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受社会心理影响的特殊性，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引进的东西进行必要的筛选，去伪存真，吸收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在研究的时候，应该学会独立思考，侧重于研究自己的问题，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体系，为中国的社会和老百姓服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会同美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苏联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日本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心理学，找出各类社会条件下社会心理的个性与共性，找出影响研究结果、理论与方法的社会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学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建立起世界性的、揭示人的社会心理的一般规律的社会心理学，为世界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至于走中国化道路应该从哪些方面起步,台湾省学者杨国枢(1982)提出4个方面的课题:①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②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③修改或创立概念理论;④改良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香港学者杨中芳(1986)提出3个方面的课题:①彻底地从头研究几个目前最重要的、但也最具争论性的研究题目;②研究一些比较属于中国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心理及现象;③适合研究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方法。这些观点都值得吸取或借鉴。

在中国化道路上,台湾学者比大陆学者先行了一步。他们提出以“草根式”研究为主导,把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固有的问题,采用自己的研究设计与工具,强调“务必使研究成果对本土社会有意义及有贡献”,做出了一些成绩。大陆学者有必要向他们学习。近年来,大陆学者也用土生土长的方法对本土上的社会心理现象做了一些研究,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心理思想做了不少挖掘和整理工作,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这些方法和成果尽管显得“土里土气”,但作为一种方向和实际行动,却是很值得鼓励的。

5. 发展团结协作

在过去的十年,我们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个人完成的,合作、协作较少。但从成果的质量和水平看,合作、协作明显优于个人。从国际经验看,一些重大的、带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也多是通过个人间的合作取得的。社会范畴和社会心理现象广泛庞大,社会心理运动形式远较机械、物理、化学、生物诸运动高级复杂,社会心理学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几乎无所不至,仅以个人形式进行研究是难以胜任的。因此,在研究方式上,我们有必要发展合作研究,提倡团结协作,精诚攻关。一些情况表明,我国的合作研究开展较少,在于合作中存在不少障碍,而这本身又主要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有必要在这方面一箭双雕。

在我国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有四支队伍。一是从心理学方向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专业人员,他们侧重于研究他人和群体影响下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与规律,如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人际情感、个体社会化等,多采用实证性方法,成果的科学性较强,但对社会结构、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把握不够。二是从社会学方向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专业人员,他们侧重于研究与社会结构、社会过程有关的群体心理现象,如群众行为、社会舆论、社会心理承受力、社会风气等,多采用经验性研究方法,成果涉及面较宽,但对社会心理的内在机制及联系注意较少。三是从应用或交叉学科方向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专业人员,他们侧重于研究与其他学科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及社会心理学应用问题,如管理中的心理学问题,犯罪行为的心理学问题,政治生活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教育社会心理学问题,消费心理学问题,广告心理学问题,体育社会心理学问题,军事社会心理学问题,政治思想工作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读者心理学问题,情报心理学问题,储蓄心理学问题,等等。有的采用实证性方法,有的采用经验性方法,研究成果层次不等,实用性较强,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涉及较少。四是党政机关及群众组织内的调研人员,他们侧重于研究特定群体的思想和社会心理动向,如不正之风中的社会心理问题,青年的思想动态与观念变化问题,工人的社会情绪问题,自杀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等等。多采用社会调查法,成果的现实性与对策性较强,理论性较弱。

目前,这四支队伍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状态,分门别类地研究。这种格局有利于“发散思维”,从不同角度探讨问题,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准备多方面的资料,在我们这个喜

欢大一统而且一统就死的社会中，不能说没有益处。但是，它也带来了比较明显的问题，如信息不畅，思路较窄，研究分散，课题重复，理论与应用脱节，以及相互间进行贬低等。这种情况在发展的初期尽管有其必然性，却也是应该加以改变的。

我们应该提倡不同方面军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更应该促进各方面军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应该通过制定学科发展规划、课题招标、基金资助等形式将各类专业人员聚合在同一课题组内开展研究工作。

增强团结、发展合作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发展和健全社会心理学的群众性组织，如社会心理学会和其中的专业委员会等。当前，我国的这类学术组织还不够普及，不少省、区尚未正式成立社会心理学会，已经成立学会的地方学术活动开展的不多，一些学会因为经费问题和内部矛盾问题难以起到团结、协作与交流作用。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应该积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各支队伍的本身也应该加强，一是扩大人员数量，二是提高自身素质。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员不论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表现出严重不足。我们应该继续发展社会心理学教育，培养出更多的学士、硕士、博士。应该大力开展培训工作，吸收更多的兼职研究人员。应该组建更多的专业性研究机构，使它们成为开展理论研究、团结各部门研究人员的基地和中坚力量。兵强马壮，各路人马团结合作，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就一定会带来社会心理学的新的的发展，新的繁荣。

• 十年来社会心理学著作选目 •

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班：《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

全国八院校《社会心理学教程》编写组：《社会心理学教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

黄育馥：《人与社会——社会化问题在美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

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

陈纪方：《社会心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

周振明等：《社会心理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

王承璐：《人际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孔令智等：《社会心理学新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许苏民：《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徐凤妹等：《社会心理的认识与调控》，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

姚平：《人际关系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

孙非等：《社会心理学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11月。

孙晔等主编：《社会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

郑永廷：《人际关系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1月。

乐国安等：《社会心理学》，中国物资出版社，1988年8月。

作者工作单位：石秀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刘卫平 华夏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庆利